

復興崗學報

民 95，88 期，31-56

中共新聞教育變革初探

徐蕙萍

新聞學系

副教授

摘 要

對中共而言，新聞傳播媒體被定位為共黨的喉舌、宣傳工具；當然，這也就造成其新聞教育的教育目標，在培養非但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宣傳人員。在培育能為共黨所用的新聞宣傳幹部的中共新聞教育，從 1983 年開始展開調整與變革，一直在中共掌控之下的新聞教育具有哪些特色？其何以要變革？變革的做法為何？在其變革中究竟產生了何種問題？是值得探究的。經過探究發現：即便其教育目標上開始重視新聞專業、課程設置內容與國際接軌、教學設備更新、革新教學方法……等，作調整，但在辦學理念上無法將「為共黨所用的新聞宣傳幹部」做根本上的變革，否則其新聞傳播教育變革，不過是冀望其所培育的人才能符合現階段所用罷了。

關鍵詞：新聞傳播、新聞教育、專業訓練、新聞宣傳幹部

壹、前言

新聞是社會輿論的嚮導，亦是社會現象的直接反應。因此，在自由民主國家，新聞傳播媒體已成為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部門」。然對於新聞傳播學教育而言，在美國學界已引發其究竟為學術，或是專業訓練（professional program）的爭論，因為其間的課程設計將著重於「學以致用」與否的問題（林靜伶，1996：131-134）。但是對於中共而言，基於新聞傳播媒體被定位為共黨的喉舌、宣傳工具；當然，這也就造成其新聞教育必須培育能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以及黨的政策之新聞工作者（張多馬編著，1995：4）。換言之，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就是在培育能為共黨所用的新聞宣傳幹部。

隨著中共經改的深化，不但推動了新聞媒體的迅速發展，而且也促使傳播媒體的內容有了顯著的變化，它從僅僅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武器、政治宣傳的喉舌和階級鬥爭的工具，轉而變成非但是共黨的意識形態武器，同時又為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服務之綜合性多功能的工具。在中國大陸政經社會變遷的狀況下，其新聞教育亦面臨不得不變革的壓力。雖說從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同年 7 月，中共中宣部和國務院教育部聯合發出〈關於加強新聞教育工作的意見〉後，中國大陸新聞教育開始步入變革時期。

1983 年中共召開第一次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中即對其新聞教育的未來發展方向和做法有所規劃；易言之，中國大陸新聞教育開始積極走向變革。事實上，從 1983 年迄今，其新聞教育調整與變革，仍持續進行中。眾所週知的，從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一直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其新聞教育是如何發展的？又具有哪些特色？何以要變革？變革的做法為何？在其變革中究竟產生了何種問題？在國內研究者不多的狀況下（張多馬在其《大陸新聞事業概況》中曾略做敘述）是頗值得探究。特別是中共對其內部一再強調研擬輿論戰、心理戰之際，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更應該深入瞭解中國大陸的人力資源供給者——新聞教育的狀況、問題與未來走向。

在本文中，將以文獻分析法，針對上述問題一一探究之。

貳、中共新聞傳播觀及其新聞教育

眾所皆知的，中共建政乃至於維持其統治，主要靠「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即報紙等新聞傳播媒體）；基於此，中共對於報紙等新聞傳播媒體所謂的

筆桿子所採取的嚴格控制措施，幾乎可以和它對軍隊的控制相比（張多馬編著，1995：1）。而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媒體在中共的政治系統之下，一直扮演為共黨的宣傳工具，不但所有的新聞媒體完全由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僚體系所控制，且在新聞傳播媒體中工作的新聞從業人員清一色是經過精挑細選，黨性堅強的共產黨員來擔任（何川，1994：104；張多馬編著，1995：1）。基於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對於培訓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之新聞工作者的新聞教育工作，自然是分外重視。

中共所培訓具有共產主義思想、黨性堅強之新聞工作者，其實，一言以蔽之，即是具有中共新聞傳播觀的新聞從業人員；因此，論及中共的新聞教育及其特色，必須先論及中共的新聞傳播觀，然後再敘述其新聞教育之沿革發展與特色。

一、中共的新聞傳播觀

誠如前述，中共的新聞傳播觀，是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及毛澤東等人在新聞傳播方面的論述，繼則由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等人再作闡述、豐富之。事實上，中共傳播學者童兵在其《比較新聞傳播學》書中即表示，「以李大釗、陳獨秀為起始，經過延安整風、《解放日報》改版實踐，至1948年毛澤東、劉少奇關於新聞工作重要講話的發表，黨報理論中的傳媒功能觀逐漸形成。」童兵並明白指出，「黨報理論中的傳媒功能觀是圍繞著黨報與黨委、黨報與群眾、黨報與實際三個關係展開的。由黨報性質所規定，黨報做為黨的宣傳者和組織者，是黨的喉舌。黨報…，要教育群眾，又要反映群眾和向群眾學習。黨報是黨開展實際工作最有力的工具，要反映實際工作，又要指導實際工作。」（童兵，2002：81）。由此足以說明中共的新聞傳播觀是深深影響其新聞體制、媒體組織以及其間的運作，然而其新聞傳播觀究竟涵蓋哪些論點？若仔細審視中共的新聞傳播觀，則其要者，不外乎下列五項，分述如下（何川，1994；盛沛林主編，2000；童兵，2002；邵培仁、陳兵，2003）：

（一）喉舌、工具論

中共承襲馬克思主義關於新聞傳播的「工具論」。馬克思認為新聞傳播也像其他國家機器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此在1928年的「共產國際綱領」中即明確規定：「新聞出版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之一」。列寧也多次強調，「報紙是黨和蘇維埃政權中的集體組織者，是建立與勞動群眾聯繫並把它們團結在黨和蘇維埃政權周圍的手段」。

這種「工具論」，經過毛澤東、鄧小平的詮釋下已成為「喉舌論」。即便在中共高層領導中較開明者，如前總書記胡耀邦，亦不例外（何舟，1993：95）；

胡耀邦於 1985 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甚至進一步將新聞傳播活動的性質和地位作了清楚的界定。胡耀邦明確指出，「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胡耀邦，1985：1）。1989 年 11 月，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一再重申此「喉舌論、工具論」，江澤民並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歷來非常重視新聞工作，始終認為，國家的報紙、電台、電視台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11/30）。

按照中共「喉舌論、工具論」的邏輯，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因此，人民不需要、不必要，也不能夠擁有自己的喉舌（新聞傳播媒體），這也充分顯示中共獨佔新聞媒體，把它作為鞏固其統治的合理解釋（Defeur, Melvin, 1970; Mcquail, Denis, 1987; Chang Won Ho, 1989; 何川，1994：45）。

在中共「喉舌論、工具論」的論調下，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媒體自然淪為共黨的統治工具，其非但無法像自由民主國家的新聞媒體那樣扮演輿論監督的角色，亦較難發揮猶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守望環境、協調統合的功能、傳衍文化的功能以及娛樂的功能（林東泰，1999）。

（二）黨性原則

論及報紙等新聞媒體的功能，馬克思與列寧皆認為，共黨無產階級專政，係建立在「高壓」與「說服」的天秤上；即以武力摧毀階級敵人，以「說服」爭取群眾支持。事實上，1901 年列寧即曾明白表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煽動者，也是集體的組織者。」報紙既為共黨統治最尖銳的武器，是組織與教育人民的工具，是協助達成共黨掌握政權的一種手段，所以必須絕對的、徹底的、完全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中（張多馬編著，1995：4）。

毛澤東承襲此種論點，認為報紙等新聞媒體應「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服務」（毛澤東，1990）。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則明白表示，「新聞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必須堅持黨性原則」（江澤民，1990：189）。

所謂「黨性原則」，依照中共的說法，就是新聞傳播活動必須在政治上和共黨中央保持一致，在組織上無條件地接受黨委的領導，遵守共黨的紀律，一切重大宣傳方針都必須向黨委請示和事後向黨委匯報，所有新聞媒體的重要言論要經過黨委集體討論，各新聞單位必須遵守「不得自以為是，不得發表與共黨中央決定相反的言論」的規定，否則將遭到查封、停刊的命運（何川，1994：46；盛沛林主編，2000：220；邵培仁、陳兵，2003：18）。

事實上，這所謂的「黨性原則」，一言以蔽之，即在鞏固政權為前提下，不但新聞傳播媒體本身必須接受共黨的領導，增強所謂的黨性，甚至於其刊載的內容完全得根據政治的需要進行變化或修改，但亦使得報紙等新聞媒體皆以「對共

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有利與否」為新聞取捨之衡量標準；凡是對共黨的方針政策有利的，就是最大的新聞，就要連篇累讀地大肆宣傳，否則再大的新聞事件也可以壓下來不報或晚報（邵培仁、陳兵，2003：16；何川，1994：41）。無怪乎，中國大陸的學者甘惜芬對於其報紙長期以來的現象，也不禁搖頭嘆息；甘惜芬曾在《上海經濟導報》，發表〈多種聲音，一個方向〉專文中，對中共報紙有所評價，茲將其略述如下（徐蕙萍，1989）：

- 1.是迫切需要瞭解的新聞不多，而不感興趣的新聞太多；
- 2.是不把真相告訴人民；
- 3.是對領導人一味歌功頌德，沒有輿論監督；
- 4.是不敢大膽批評時弊，繞著矛盾走；
- 5.是不能代表人民向國際發言；
- 6.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與官方不同的意見；

上述的評價，雖然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芬教授於1989年「六四」前夕所發表的觀感；然審視當前的中國大陸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即便20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已讓其有不少的變化，和稍許的開放（徐蕙萍，2004：175），但在這所謂的「黨性原則」下，仍較難發揮猶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輿論監督的天職。

（三）輿論導向的灌輸原則

在中共眼中，新聞傳播媒體的主要功能就是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為政治服務的。換言之，在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宣傳、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為目的。事實上，早在1948年，毛澤東就明白表示，「黨報的基本任務就是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以及黨的政策」（毛澤東，1990：71）。

眾所周知的，中共最早是靠宣傳起家的；換言之，中共最懂言論、輿論對一個政權監督制約的威脅，致使中共建政後，立刻採取控制言論的手段，共黨非但對新聞政策、編輯方向的指導，而且從中央、地方，到基層所有的各類行的傳播媒體都受到管制；甚至對傳播媒體從機關到個人，從社論到新聞，從財政到人事進行了全面的、多重的、徹底的直接控制（張多馬，1995：11）。

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在中共的嚴密掌控下，關於新聞媒體的報導方向及內容，都是由中共中央來決定，此即中共所謂的「輿論導向」（何川，1994：108）。關於「輿論導向」的概念，就中共傳播學者陳力丹的說法，其可以參照傳播的理論假設就是議題設定理論（agenda-setting），即媒體如何引導公眾形成輿論或轉變已有的輿論。簡言之，即如美國政治學家科恩（Cohen, B.）逾1963年論及報紙作用時所說的：「報紙或許不能直接告訴讀者怎樣去想（what to think），卻

可以告訴讀者想些甚麼（what to think about）」（陳力丹，1999：78）。具體而言，中共所要求的「輿論導向」，必須依照中共的價值標準來影響傳播方向，這個價值標準就是共黨的意識型態及其方針、政策（何川，1994：87）。事實上，中共曾明白表示，其「強調輿論導向的目的，即在於希望各種非主流的思想觀念，以及其他一些屬於主流思想的形式不一的思想觀念，能夠同現實的意識型態協調，趨向於它」；中共甚至毫不避諱地指出，「至少不要影響現實意識型態對全局的控制，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陳力丹，1999：27）。對於新聞媒體的報導方向及內容，都得由中共中央來決定的所謂「輿論導向」，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明白表示，「歷史經驗反覆證明，輿論導向正確與否，對於我們黨的成長壯大，對於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對於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繁榮富強，具有重要的作用。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人民日報》，1996/9/27）。

中共通過對新聞傳播媒體運作的控制，使輿論導向循著其所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政治的需要發展，這種以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及其方針、政策為目的的宣傳觀，一直被中共貫徹實施中。

（四）正面宣傳的報導方針

對於新聞從業人員而言，選擇新聞的標準，莫衷一是，但一般來說，時效性（timeliness）、接近性（proximity）、顯著突出（prominence）、後果（consequences）等，則是較公認的選擇標準。但若就新聞媒體企業組織而言，新聞是知識產品也是經濟產品，新聞必須符合企業目標，來自企業內部的控制則是很難避免的，而新聞媒體也必須與其他政經團體互動。再者，新聞除了是企業成品外，更是新聞人員綜合其專業素養與人生歷練的文化產物（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209）。

基於此，雖然客觀、準確與平衡公正報導是新聞品質的主要象徵，但經過層層的產製與守門過程，新聞實在很難達成絕對客觀與公正（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210），則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新聞是否具有價值，則繫於新聞的真實性與否；換言之，倘若報導不真實，新聞就不成為新聞，新聞媒體亦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但是在中共的新聞觀念中卻強調真實性要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明白指出：「我們所說的新聞的真實性，同新聞工作的階級性是一致的」（江澤民，1990：190）。易言之，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所刊載的新聞，真實性並非首要，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也就是所謂的新聞要為政治服務。

基於此，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新聞報導方針，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遵循的一條極為重要的方針。依據中共的說法，「所謂堅持正面的宣傳，就

是要準確、即時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主流，讓人民群眾創造新生活來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們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李瑞環，1990：201）。

若檢視中共建政以來新聞傳播媒體所謂的堅持正面的宣傳，簡言之，就是「報喜不報憂」。中共對此，不但在理論上有系統的闡述，甚至已形成一套指導新聞媒體運作的原則與規範。特別是在其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所有報紙、電台都充斥著「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的所謂「浮誇新聞」（何川，1994：43）。至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中共對正面報導制定了嚴格的限制，規定：歌頌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光明面的報導，與批評社會主義缺點和陰暗面報導的比例為八二開，此即所謂的「計劃新聞」。事實上，此為胡耀邦於1985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關於黨的新聞工作〉時規範的；胡耀邦明白地指出：「因為社會主義的主導方面是光明的，同時也存在著陰暗面，所以報紙上，大體是八分講成績、講光明，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搞批評。即使是陰暗面，也要注意態度問題，一定要指出我們有信心消滅它」（胡耀邦，1990：288）。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八二開的「計劃新聞」，並非針對所有的新聞報導所規範的，因其八分歌頌光明面的報導，只限於中國大陸報導的比例，對國際新聞，尤其是報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於關於台灣的報導，這個比例就會被顛倒，變成「二分成績，八分缺點」，竭盡所能地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日薄西山。依據學者何川研究顯示，特別是在其黨營媒體的報導中，對美國的描述，則是吸毒、槍殺、經濟衰退、鉅額赤字和侵略、干擾他國；至於對台灣的報導則總是污染嚴重、立法院立委打架、黨派傾軋、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等，這種醜化西方和台灣的報導，就是以資本主義的「八分陰暗面」來襯托社會主義的「八分光明面」；其主要作用在強化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的論點（何川，1994：53）。即便時至今日，中共中宣部動輒施加政治壓力「不准負面報導」，否則，不是記者、編輯到主管部被罰扣數月工資，就是禁播，或斷訊處置¹。

新聞報導若一味地「報喜不報憂」，或是採取「八分講成績、講光明，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搞批評」的所謂八二開的「計劃新聞」；即使新聞並非虛構，

¹ 《聯合報》披露，中共最近收緊意識形態控制，中宣部警告上海《第一財經》、北京《經濟觀察報》、廣州《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三家報紙，要它們「三個月不准做負面報導」；在正治壓力下，大陸一些媒體內部規定，「慎重把握熱點，嚴格控制負面，嚴禁報導外省負面新聞」；更有媒體規定，一旦被中宣部「閱評小組」點名，記者、編輯到主管部被罰扣數月工資；無獨有偶，香港鳳凰衛視報導山西省委副書記和省委組織部長操守問題，受到報復，山西當局不但切斷該電視台在當地的播出，並上告中宣部，中宣部隨即通知鳳凰衛視，不得再做類似報導，包括中共官方已公佈的高官被處理新聞，也在禁播之列（《聯合報》，2005/3/25）。

亦非真實的。當然，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所刊載的新聞，真實性並非首要的狀況下，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中共「以正面報導的宣傳方針」，其著眼點仍在於所謂的新聞要為政治服務。

（五）新聞的時效服從於政治需要

論及新聞，真是眾說紛紜，但時間性、重要性與正確性，則是眾所公認的，至少應有的新聞構成的三項基本要件（鄭貞銘、張世民、呂傑華增修，2003：3-11）；其中，「時間性」就是時效性，是指「事實發生和公開報導之間的時間差」。也就是說，任何新聞，都必須是新近的報導，也唯有最新的第一手報導，才具有時間性。時間性愈強烈，其新聞的價值亦愈高。因為報導愈快速，就愈新鮮，愈新鮮，閱聽大眾就不會透過其他方式去知悉。若新聞不能即時報導，待失去時效時再做報導，那就根本失去了新聞的價值，瞬間即成為歷史資料了。特別是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裡，新聞傳播事業的整個趨勢就是求快、求速，強調時效性；甚至認為「時效性就是新聞的生命」（何川，1994：54）。

然而，在中共的新聞觀念中，「新聞」並不一定要「新」，一切都必須從政治上考量。事實上，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就曾明白表示：「新聞究竟早登還是遲登，這個時間性問題必須從政治上考慮」（胡耀邦，1990：288）。

由於新聞傳播媒體在此一原則的制約下，故而中國大陸的所有新聞機構在處理新聞時，皆是從政治上以及宣傳效果上來考慮。事實上，有學者長期的研究統計發現，中國大陸新聞機構的編輯部門，在處理新聞時，常常有一套固定的術語，對十天以內的新聞，有關這新聞發生的時間的用法是「日前」、「最近」等含糊不清的時間用詞來表示，至於一些早已過時的舊聞，為了宣傳需要則往往不交代時間或乾脆從老遠談起，例如：「去年以來」、「近幾年來」等詞彙來說明。就以《人民日報》為例，其刊載的新聞中，以這樣的方式表現時間概念的居然占日載新聞的60%以上（何川，1994：55）。無怪乎，中國大陸的傳播學者陳力丹也不得不承認，「由於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具有很大的政治權威，大眾傳播媒介也具有較強的政治性質，因而它們對個人意見和群眾意見的影響比任何國家的都強大。…黨和政府及其領導人對輿論的影響，在中國政治性問題的輿論形成方面，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陳力丹，1999：55）。

由於中共這種無視新聞時效的作法，反而導致中國大陸新聞的「出口轉內銷」的狀況（何川，1994：56）；也就是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新聞或重要事件，常常在港台或外國媒體曝光後，中國大陸新聞機構才播報或刊載，當然，這種狀況的發生，除了是因為中共的新聞封鎖外，還有即是中國大陸新聞機構長期以來的從政治上考慮，而無視於新聞的時效性所肇致的結果。

在中共如此的新聞傳播觀點支配下，特別是「黨和人民的喉舌」以及「『新

聞』並不一定要『新』，一切都必須從政治上考量」等特性，就決定了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與自由民主國家的新聞媒體迥然不同的作用與任務。

二、中共新聞傳播觀下的新聞教育

（一）中共新聞教育的沿革與發展梗概

論及中共新聞教育的發展過程，依據學者們的研究，歸納言之，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即：（1）萌芽時期；（2）調整時期；（3）發展時期；（4）文革停滯時期；以及（5）變革時期等，概述如下（張多馬編著，1995：19-24；童兵，2002：347-349）：

1. 萌芽時期

共產黨自 1921 年 7 月 1 日成立以來，對於新聞與宣傳工作十分重視，是以在中共政權尚未建立以前，即曾舉辦過一些短期的新聞幹部訓練班和新聞學校，培訓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新聞工作者。這些短期的新聞訓練班，實質上是以政治理論教育和思想改造為主，新聞實務和理論教育為輔的。

1949 年以前，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在國民政府管轄下，仍屬於當時仿效西方模式的新聞教育；至於中共的新聞教育是在民國 28 年於延安的中國女子大學設立新聞系時，才正式開始，但不久即停辦；中共新聞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遂轉由各新聞機構自行負責，例如：「新華通訊社」、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及各地中共黨報，都是透過自身機構來培訓所需的新聞工作人員。1943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甚至發布《關於解放日報幾個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各級宣傳部應將通訊員的組織教育工作，作為自己的重要業務之一」，以擴大培訓新聞宣傳人員的訓練範圍。因此，中共新聞教育的初期發展，就頗類似英國的學徒式為培養新聞人才的主要方式（張多馬編著，1995：20）。

中共新聞教育的初期，是由各新聞機構自行負責來培訓所需的新聞工作人員，此種教育方式，非但教育意識相當薄弱，而且，它的教育目的，只是在於培養共產黨的宣傳人員，而非真正的新聞專業人員。因此，中共學院式的新聞教育，直到 1960 年代才逐漸建立。

2. 調整時期

基於社會制度的不同，政治思想體系、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亦大異其趣，國民政府時期的那些仿效西方模式的新聞教育，對中共而言，已不再能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與發展；中共建政初期，對於新聞教育體系進行了全面的改造。除屬於國民黨的新聞教育單位，如南京的國民黨政治大學新聞系等，一律停辦外，對其他新聞教育單位，如北京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上海的復旦大學新聞系、

聖約翰大學新聞系、暨南大學新聞系、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中國新聞專科學校、蘇州的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廣州的國民大學新聞研究班等，除在人事管理上調配共黨的新聞工作者擔任教職外，並在教學內容上進行改革，如開設馬列主義政治理論課程、變更新聞系教學內容及派由共產黨新聞宣傳人員赴校授課等方式，對這些新聞教育機構的師生，積極進行新聞理念與政治思想的洗腦工作。

1949 年 11 月 1 日，新華社總社在北京舉辦的新聞訓練班，自第 3 期起改建為北京新聞學校，附屬於中共新聞總署，由新聞總署副署長兼任校長，這是中共建政後共黨創辦的第一所新聞專業學校（但只辦了兩期，1951 年 7 月第二期畢業後停辦，共培訓學員 500 餘人）。1949 年 7 月 19 日，上海華東新聞學院創立，這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所創設的新聞幹部學校。

1952 年，中國大陸的高等院校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上海的華東新聞學院、暨南大學新聞系、聖約翰大學新聞系、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等併入復旦大學新聞系，使復旦大學新聞系成為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新聞系。北京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併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改為編輯專業，後又改名為新聞專業。蘇州的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隨該學院併入江蘇文化教育學院，不久，停辦。1954 年，中共中央黨校設立新聞班，主要培訓相當於省委機關報的新聞幹部。1955 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創立，為中共建政後新創辦的第一所大學新聞系。

3. 發展時期

1958 年開始，中共新聞教育事業方面也有了逐步的發展。1958 年 6 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合併到 1955 年 4 月創設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新聞班在是年停辦後部分教師也被調入該系，使全系師生高達 800 多人，是中國人民大學最大的一個系。1958 年 9 月 2 日，中央廣播事業局直屬的第一所高等專科學校——北京廣播專科學校成立，翌年改組為北京廣播學院。此外，杭州大學、江西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西安政法學院（此為共軍軍事院校）先後創辦了新聞系或新聞專業。暨南大學復校後也建立了新聞專業，加上復旦大學新聞系，共有八所大學設有新聞專業。

1959 年，中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又創辦北京廣播學院，這是中共第一所專門培育廣播、電視新聞人才的高等院校；該學院並設有新聞系、技術系、播音班等系科。

4. 文革停滯時期

1961 年調整開始，杭州大學、江西大學、南京大學、西安政法學院的新聞學系和專業停辦。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及文化教育事業受到嚴重摧殘，各地的新聞院校陸續停辦，停止招生或解散，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停止

招生即達十年之久，直到 1970 年冬季，部分高等學校的部分系科招收首批工農兵學員，其中包括復旦大學新聞系，學制為 3 年。

此一期間，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呈現停滯狀態，而整個新聞事業的發展也陷入黑暗時期（張多馬編著，1995：23；童兵，2002：349）。

5. 變革時期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同年 7 月，中共中宣部和教育部聯合發出〈關於加強新聞教育工作的意見〉後，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並開始步入變革時期。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增設新聞系，武漢大學、四川大學、山西大學、河北大學、鄭州大學、廣西大學等都開設新聞專業，廈門大學設立了新聞傳播系，一些省還創辦了業餘新聞學院和廣播電視中等技術學校；但畢業的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卻不能滿足中國大陸大眾傳播媒介迅速發展的需要（張多馬編著，1995：24）。

因此，中共提出要加強新聞教育工作，要求每一個省和自治區在可能的條件下，動員各方面力量籌建新聞系或新聞專業，加速新聞專門人才的培養。

1983 年中共召開第一次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1984 年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學會成立，促使其新聞教育事業開始蓬勃發展。依據中共的統計，從 1983 年到 1996 年年底，經中共教育部批准備案的設有新聞類本科專業的普通高校共 55 所，新聞專業學校 88 所，在校生已達 9000 人。如果加上近些年未經中共教育部批准備案的專業學校，全中國大陸大約有 317 個新聞專業教學機構。迄今，中國大陸共有新聞學專業與傳播學專業碩士授與院校 21 所，博士授與院校 6 所（謝炳炎，2003：76）。

從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迄今，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無論在師資、課程內容或是新聞理論與實務的配合方面，都作了相當的調整。依據中共的統計，畢業生已達 30000 多人，還培養碩士千餘人，博士 50 多人（童兵，2002：349）。

雖然從中共新聞教育的發展過程來看，可概略分成（1）萌芽時期；（2）調整時期；（3）發展時期；（4）文革停滯時期；以及（5）變革時期，但若審視中共建政以來迄今，其新聞教育的發展或有緊縮停頓，但其教育目標在培養非但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宣傳人員，則是不變的。

（二）中共新聞教育的特色與問題

教育是個人經由所有的歷程，以發展其對社會具有積極價值的各種能力、態度以及其他行為之總和（伍振鷺、高強華，2001：5）。故而教育有其教育目標，所謂教育目標，具體言之，可以說是教育活動預定的理想或準據，也即是教育活

動所要達成預期的成就或所要獲取的預期結果（伍振鷺、高強華，2001：30）。而新聞教育目標，則是為新聞傳播媒體培育合格的從業人員；關於此，無論是自由民主國家或是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極權主義國家的新聞教育目標皆是一致的，只是在培養何種類型的新聞工作者上，卻有所不同。中共是將其新聞教育目標訂定為：培養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熟悉新聞宣傳政策法規，具有系統的新聞理論知識與技巧，具有廣博的文化與科學知識，體魄健全，能從事新聞、出版與宣傳工作的專門人才（童兵，2002：358）。

中共所培訓的新聞從業人員，非但要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從業人員，基於此，它對於其從業人員的要求也較之其它部門嚴格。為此，中共中央宣傳和組織部門均制定了嚴格的人員選調標準。依據中共傳播學者的研究，在中國大陸要從事新聞宣傳的工作人員應具備的條件，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質、道德品質素質、業務素質三方面。所謂思想政治素質是指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高度的政治覺悟，自覺維護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²，堅決執行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嚴格遵守共黨的宣傳工作紀律³，旗幟鮮明地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作堅決鬥爭。而所謂道德品質素質，則是指熱愛共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忠於職守；至於業務素質，則是指具有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準和政策水平，完整系統的專業知識等等（喻權域，1990：74；何川，1994：105）。

也就由於在中國大陸若要從事新聞宣傳的工作人員，基本上必須具備包括思想政治素質、道德品質素質、業務素質三方面的條件。因此培訓這些非但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教育工作，自然是與自由民主國家的旨在培育具備新聞傳播專業能力的優秀新聞人才，進而服務大眾的新聞教育，是大異其趣的。若審視中共建政以來的新聞教學情形，與自由民主國家的相較，其具有以下三項特色，概述如下：

1. 政治正確凌駕新聞專業

誠如前述，在中國大陸若要從事新聞宣傳的工作人員，基本上必須具備包括思想政治素質、道德品質素質、業務素質三方面的條件。事實上，新聞專業固然是中國大陸新聞教育所著重的，但其更重視學生是否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高度的

² 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是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人民民主專政）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何川，1994：56）。

³ 為了防止新聞報導同中共中央高層要求不一致的情況，中共中央制定了嚴格的宣傳把關標準和新聞宣傳的工作紀律。所謂宣傳把關標準，主要是指政治標準，看其是否體現了鮮明的黨性原則。所謂新聞宣傳的工作紀律，即是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的領導（何川，1994：95）。

政治覺悟，以及能否堅決地執行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的政治理論課程；易言之，政治正確凌駕新聞專業是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特色之一。

2. 宣傳幹部勝於新聞專才

基於在中共眼中，新聞傳播媒體的主要功能就是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為政治服務的。故而在中國大陸新聞教育機構所培養出來的人員，非但要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宣傳幹部；就此而言，宣傳幹部勝於新聞專才，實為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另一特色。

3. 課程內容政治多於專業

中共的新聞教育，在教學品質上，要求要合乎中共的標準——也就是必須具備：（1）具有無產階級性，掌握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並瞭解共黨的方針政策。

（2）掌握新聞工作的基本規律和方法；能密切聯繫群眾，善於調查研究；有較敏銳的觀察、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較高的寫作水平。（3）健康的身體（鄧力群，1984：62-63）。基於此，其課程的設置，除新聞專業、語文、社會科學課程外，馬列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比重頗高，例如：馬列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包括四們必修課，即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革命史（張多馬編著，1995：25）。

因此，在課程設置方面，馬列主義政治理論課程多於新聞專業，實為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另一特色。

也就由於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員，非但要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宣傳幹部，故而呈現政治正確凌駕新聞專業，在課程設置方面，馬列主義政治理論課程亦多於新聞專業；致使其隨著中國大陸經改的深化、政經社會的變遷，及媒體環境丕變，新聞教育已無法適應中國大陸政經社會的需求了。

參、中共新聞教育變革之肇因

一、外緣

（一）政經社會變遷，新聞教育政策更迭

由於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新聞傳播媒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促動角色。因此，當中共於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為了有效地推動經濟改革的進行，利用新聞傳播媒體進行輿論宣傳是中共的主要手段，其結果不但推動了新聞媒體

的迅速發展，而且也促使傳播媒體的內容有了顯著的變化，它從僅僅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武器、政治宣傳的喉舌和階級鬥爭的工具，轉而變成非但是共黨的意識形態武器，同時又為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服務之綜合性多功能的工具。但如此一來，不但肇致中國大陸大眾傳媒的蓬勃發展，更因新傳播科技的發展，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和網民人口的急遽增加（據中共的統計，現已有 8700 萬人），以及外國跨國傳媒的進駐…等，面對此政經社會的變遷，以及蓬勃發展下的新聞傳播媒體需才孔急之下，負責培育中共新聞宣傳幹部的新聞教育機構，勢必得有所變革以為因應。因此，中共新聞教育政策遂在「有計畫、有步驟地培養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充實、壯大新聞隊伍，確實成為中國大陸新聞事業所面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的狀況下（鄧力群，1984：63），為之調整。

（二）媒體環境丕變，教育亟需調整因應

誠如前述，自中共實施經改後，為了有效地推動經濟改革的進行，利用新聞傳播媒體進行輿論宣傳是中共的主要手段，其結果不但推動了新聞媒體的迅速發展，而且也促使傳播媒體的內容有了顯著的變化，它從僅僅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武器、政治宣傳的喉舌和階級鬥爭的工具，轉而變成非但是共黨的意識形態武器，同時又為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服務之綜合性多功能的工具。但如此一來，亦導致中國大陸大眾傳媒的蓬勃發展（請參見歷年《中國新聞年鑑》提供的統計數據）。例如，從 1978 年全中國大陸有報紙 186 家，1982 年公開發行的則有 659 家，到 1998 年報紙有 2053 家；電視台從 1958 年開始創設，到 1998 年全中國大陸已有綜合電視台 880 座，教育電視台千餘座，有線電視台 700 多座，迄今，中國大陸無論報業或是廣播電視，都有蓬勃的發展，甚至已組成 40 多家的報業集團。換言之，中國大陸的新聞事業由單一的媒體向多媒體發展（謝炳炎，2003：75）；到了 80 年代的中後期，中共政府已經難以承受對新聞媒體的迅速膨脹的財政補貼⁴，於是，報業等新聞媒體，中共遂將其由共黨的事業單位，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產業單位（陳懷林、黃煜，1996：193）；報業等新聞媒體必須從報導內容、印刷、廣告與發行……等，做不同程度的調整與改革。

換言之，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環境變遷，為滿足媒介特殊資源—人力資源需求的新聞教育，必然受到媒體環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進而引發人力資源供給者—新聞教育的調整與改革。

⁴ 中共視報紙等新聞傳播媒體為喉舌、宣傳的工具，致其內容盡為各種會議新聞及領導者活動消息所充斥，報導千篇一律，無法吸引人，遂成為得依靠行政命令方式強制要求下級單位訂閱的所謂官辦、官養、官訂的共黨事業單位；雖然對於其報紙一直採取補貼政策，致其財政難以負荷（陳懷林、黃煜，1996；李良榮，2003；阮志孝，2004）。

（三）資訊時代來臨，新聞人才需求孔急

隨著資訊社會的來臨，以及新傳播科技的運用與發展，印刷媒體由鉛字排版走向電腦排版，甚至網際網路的運用，導致電子報的出現；而電子媒體的廣播電視，也由類比走向數位化…等等；中國大陸新聞媒體需才孔急，為滿足媒介特殊資源—人力資源需求的新聞教育，在受到媒體環境直接、間接的影響之下，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勢必得調整與改革，否則所培育的人員無法為新聞媒體所用。更何況，自上世紀 2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就以培養報紙編輯人才為主要目標，隨著廣播電視的出現，培養目標又被擴展為「培養新聞工作幹部，即從事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台的文字工作的人才」，故而在中國大陸新聞媒體需才孔急的狀況下，就誠如中共新聞傳播學者謝炳炎所指出的，「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當前急需的是那種對資訊反映的敏感、在某領域有獨到知識和研究、善於思考的新聞人才」（謝炳炎，2003：76）；中共的人力資源供給者—新聞教育遂不得不變革以為因應。

二、內因

（一）喉舌定位下的教育目標，理論實務難以整合

中共認定，「新聞工作是政治性和業務性都很強的工作」；因此，它在發展新聞教育的同時，不單重量，且在質上亦要求合乎中共的標準—也就是必須具備：（1）具有無產階級性，掌握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並瞭解共黨的方針政策。（2）掌握新聞工作的基本規律和方法；能密切聯繫群眾，善於調查研究；有較敏銳的觀察、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較高的寫作水平。（3）健康的身體（鄧力群，1984：63）。換言之，中共所培訓的新聞從業人員，非但要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從業人員；但是在此喉舌定位下的教育目標，理論實務難以整合，特別是隨其經改的深化、媒體環境丕變，再加上資訊時代來臨，新聞人才需求孔急，如此「新聞工作是政治性和業務性都很強的工作」的要求，是非變革不可，否則無法適應需求了。

（二）「入世」媒體全球化，教學亟待精進因應

報刊等新聞傳播媒體被中共視為鞏固意識型態和思想宣傳任務的「黨的喉舌」，然當加入世貿組織（WTO）後，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就誠如其新聞傳播學者所言的，「它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大陸新聞傳播事業將日益成為世界新聞傳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積極參與國際新聞競爭，同時又要面對其它國家對本地的新聞競爭。媒介全球化帶來的思想與文化以及技藝上的衝擊，為大陸的新聞傳播教育帶來了新的課題」（謝炳炎，2003：76）。

加入 WTO 後，媒介全球化所帶來的思想與文化以及技藝上的衝擊，中國大陸的人力資源供給者——新聞教育亟待調整、精進，否則無法因應。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新聞教育變革的肇因，是隨其經改的深化、媒體環境丕變，再加上資訊時代來臨，新聞人才需求孔急，原先喉舌定位下的教育目標，已難以因應，故而新聞教育政策必需隨之更迭，否則無法因應媒介全球化所帶來的思想與文化以及技藝上的衝擊。

肆、中共新聞教育變革之作法與問題

中共中宣部及國務院教育部於 1983 年 5 月 25 日召開了政權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中，不但訂定了新聞教育發展規劃的辦法，並擬定新聞教育改革的方向。其所訂定的新聞教育發展規劃的辦法有五（鄧力群，1984：61）：

1. 擴大招生人數

從 1983 年開始，逐步增加新聞專業的招生人數。除本科生外，還增加專科生、研究生和第二學士學位生的招生名額。

2. 增設新聞專業班

籌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並逐步使之成為全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中心。另並在全省、市、自治區內，凡合乎條件的綜合大學，都逐步設置新聞專業。

3. 改變專業單一化的狀況

合乎條件的院校將逐步增設廣播電視、國際新聞、新聞攝影、新聞事業管理和廣告學等專業。

4. 多層次地培養幹部

除培養新聞工作中的編、採、播、譯人員，另並著重新聞教學、科研單位等人員培養。

5. 加強在職新聞幹部的培訓

關於新聞教育改革的方向，中共認為新聞教育應該進行以下的改革（鄧力群，1984：63）：

1. 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德育放在首位。（此所謂的「德育」、是指必須符合、遵行黨的政策方針。易言之，即在加強思想教育，使之具有堅強的黨性）。

2. 從實際出發，改革招生、分配制度。對招生、錄取人員，著重於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要求。

3. 加強教學工作，改革教學內容和方法。由於認定「馬列主義理論是新聞工

作者觀察、分析社會的武器」，因此，將特別注重和加強。至於新聞理論與業務等新聞專業課程，以及語言、文學、歷史課程也將分別加強。

4.積極發展科學研究，並編寫全套新聞學教材。

5.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大力提高教師水平。

在基於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共認為：必須「有計畫、有步驟地培養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充實、壯大新聞隊伍」，中共的新聞教育改革遂依照其所規劃的方向、作法做調整、變革。

一、新聞教育變革之作法

（一）教育目標上，開始重視新聞專業

誠如前述，中共是將其新聞教育目標訂定為：培養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熟悉新聞宣傳政策法規，具有系統的新聞理論知識與技巧，具有廣博的文化與科學知識，體魄健全，能從事新聞、出版與宣傳工作的專門人才（童兵，2002：358）。此係因中共所培訓的新聞從業人員，非但要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且能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組織上服從共黨領導之新聞從業人員，故而其新聞教育目標上，始終是政治正確凌駕新聞專業；自從新聞教育改革後，除馬克思主義等政治理論課程外，對於新聞專業課程也開始重視，其開設的主要專業課程如：《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事業史》、《外國新聞事業史》、《新聞採訪與寫作》（或《新聞採訪》、《新聞寫作》）、《新聞編輯與評論》（或《新聞編輯》、《新聞評論》）、《馬列新聞論著選讀》、《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讀》、《大眾傳播學》、《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道德》、《新聞攝影》、《廣播電視學》、《廣告學與公共關係學》（或《廣告學》、《公共關係學》）等。課程設置的比例：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學分比分別佔 30%、26%、44%（童兵，2002：352）。期望學生畢業時能獲得以下的知識和能力：

- 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知識。
- 2.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知識。
- 3.新聞學理論與新聞工作歷史與現狀知識。
- 4.新聞採訪、寫作、編輯、評論、攝影等業務知識與技能。
- 5.一門外國語的基本知識與運用能力。
- 6.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與自然科學常識。
- 7.調查研究和社會活動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充分說明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目標上，已開始重視新聞專業。

（二）師資擴充上，遴選學歷實務兼具

在中共「有計畫、有步驟地培養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充實、壯大新聞隊伍」的新聞教育政策下，師資不足，則成為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問題。根據中共的最新統計，全中國大陸從事新聞教育的教師從 1982 年的 364 人，到 2003 年的 1203 人，雖然就其現況來看，以 1203 名師資，卻得分佈在 317 個新聞專業教學機構（無論是否經過中共教育部批准備案的，皆包括在內），平均每個新聞專業教學機構僅 4 人，師資人力嚴重不足。但師資的成長，從 1982 年的 364 人到現今的 1203 人，是呈現倍數的成長；在這些師資中，80 年代時期，教授無幾，現有 231 人，副教授 432 人，另有兼職教授、副教授 200 多名（童兵，2002：349；謝炳炎，2003：76）。

中共傳播學者雖然亦承認其新聞教育的師資，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有相當的成長，但相對於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擴充之快（從 1978 年全中國大陸有報紙 186 種，雜誌 930 種，到 1998 年報紙有 2053 種，雜誌 7999 種；電視台從 1958 年開始創設，到 1998 年全中國大陸已有綜合電視台 880 座，教育電視台千餘座，有線電視台 700 多座，迄今，並逐漸走向報業集團發展），在求過於供的狀況下，師資仍屬不足（童兵，2002：54）。

（三）教學方法上，理論實務開始兼顧

所謂教學方法，是教師依據教學的原理，運用適當的方法、手段，藉準備、溝通、概括、評量等歷程，用以指導學生自動學習，以獲得知識、技能、情操和理想的活動。教學的方法應隨教育理念和科技工藝的進步而不斷地有所調整和革新（伍振鷺、高強華，2001：181）。

依據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學者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教學方法多較呆板，特別是在 1978 年以前，教學方法大多是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學生只能記筆記；1978 年新聞教育改革後，在教學方法上亦做了調整，不少新聞院校的教師採取了啟發式、討論式和多媒體教學方式，並且開始重視他們所謂的「實踐性教學環節」，此即是臨時性的採訪寫作、社會調查和大小兩次新聞工作實習等，一般安排在 30 週以上（童兵，2002：352；謝炳炎，2003：76）。

雖然，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學者的調查研究顯示，學生對於教學的滿意度仍然不高（謝炳炎，2003：77）；但亦說明其在新聞教育教學方法上，理論實務已開始兼顧。

（四）課程內容上，政治與專業課並重

依據中共傳播學者童兵（2002）的研究指出，在課程設置及學分分配上規定，應修 158 學分；其中，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 16 學分，思想政治教育 3 學分；通識基礎教育（含任選課）則不少於 80 學分；專業教育不少於 54 學分；體育不少於 4 學分；在專業教育方面，除組織學生參加一定的社會調查、參觀、訪問外，

並於第六學期，安排學生去校外新聞單位實習一個學期，此業務實習為6學分，待業務實習結束後，並得撰寫實習報告，作為學年論文，此為2學分。

另外，為期望學生未來能適應社會的需要，鼓勵學生多學習和掌握經濟學理論和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鼓勵學生選修外系的有關課程，副修第二專業。每學期應選修26-28學分的課程。另外，並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各種學術講座。關於中國大陸新聞教育新聞學專業課程設置及學分分配表(如表一)及其教學計畫表(如表二)如下：

表一 中共新聞學專業課程設置及學分分配表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各學期學分配置								應修學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必修	馬克斯主義原理	6	3	3							23
	中國革命史	3	3								
	政治經濟學	4				4					
	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	3							3		
	法律基礎	6		2	4						
	大學生品德修養	1									
必修	外國語	22	4	4	6	6	2				77
	數學	8	4	4							
	計算機應用	6			4	2					
	計算機實驗	2									
	古代漢語	6		3	3						
	現代漢語	2	2								
	中國古代文學	6			3	3					
	中國現當代文學	4						4			
	外國文學	4							4		
	邏輯學	3				3					
選修	社會學概論	3				3					54
必修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	3				3					
	當代科學技術概論	3					3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					2				
選修	統計學原理	3			3						
必修	新聞學原理	3	3								54
	寫作基礎	3	3								
	中國新聞事業史	3		3							
	新聞採訪與寫作	6		3	3						
	報紙編輯	3				3					
	新聞攝影	3					3				

中共新聞教育變革初探

選修	電子新聞媒介理論與實踐	3						3			
必修	新聞評論學	3							3		
	外國新聞事業史	3							3		
	馬克斯主義新聞理論	2							2		
選修	廣告學概論	2					2				
	公共關係學概論	2							2		
必修	大眾傳播學概論	2			2						
	新聞法規與新聞政策	2							2		
	電腦編輯	2					2				
選修	專業採訪寫作	2							2		
	雜誌編輯	2					2				
	傳播媒介管理概論	2								2	
	新聞倫理學	2								2	
必修	專業外語	2							2		
選修	大眾傳播心理學	2								2	
必修	體育	4	1	1	1	1					4
	專項體育	1					1				
	任選課	6									

資料來源：童兵（2002）。《比較新聞傳播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355。

表二 中共新聞專業教學計算表

項目 周數 學期	入學 教育	軍 訓	勞 動	課堂 教學	考 試	學年 論文	專業 論文	社會調查 業務實習	畢業 教育	假 期	合計
一	1	4		13	2					4	24
二				18	2					8	28
三				18	2					4	24
四			1	17	2					8	28
五				18	2					4	24
六						2		18		8	28
七				18	2					4	24
八				10	1		8		1		20
合計	1	4	1	112	13	2	8	18	1	40	200
百分比	0.5	2	0.5	56	6.5	1	4	9	0.5	20	100

資料來源：童兵（2002）。《比較新聞傳播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356。

從中共新聞教育課程設置及學分的分配可知，雖然其馬克思思想政治理論課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佔 16 學分，思想政治教育佔 3 學分；但就 158 學分的比例來看，其課程設置及學分分配上，已顯示出思想政治理論與專業課程並重。

（五）教材編著上，鼓勵撰寫編著教材

眾所周知的，教材包括教學的內容（subject matters or contents）和學習的材料（materials）。凡是教師用來協助學生學習的各種材料，例如教科書、幻燈片、圖片、影片、唱片、錄音帶、錄影帶等都是教材、而上述材料的題材或內容都是協助學生學習，俾能達成教學的目標。換言之，教科書是一項重要的教材，教材卻絕非僅僅只限於教科書（伍振鷺、高強華，2001：165）。不過，就中共學者們的說法，教科書等同於教材（童兵，2002：349；謝炳炎，2003：76），因此，因循之。

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新聞傳播根本沒有專業教材，只有幾個大綱和一些文件；如今，在積極編撰之下，中共新聞傳播學者童兵坦承，「這幾年來，體系得到調整，有所改革。新聞理論、中外新聞史、採訪寫作編輯評論四大業務課以及廣播電視新聞攝影等教材，目前業已配套」（童兵，2002：349）。

雖然依照中共新聞傳播教育學者童兵的研究顯示，這幾年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專業教材的編撰業已編撰完成，但多屬於 70 年代或 80 年代初所編撰的，雖亦曾經修訂或新編，但隨著新傳播科技的運用以及中國大陸新聞媒體的蓬勃發展，已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再者，有的教材內容非但老舊，且交叉重複嚴重，大專、本科和碩士研究生的同一科目的教材，幾乎雷同（童兵，2002：350）。雖然如此，但亦說明其在新聞教育教材編著上，是積極鼓勵撰寫編著教材的。

二、中共新聞教育仍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品質不一

依據中共的統計，從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迄今，從新聞傳播院校畢業的學生已達 30000 多人，還培養碩士千餘人，博士 50 多人，其中相當一部份已成為中國大陸新聞界的領導幹部和業務骨幹。（童兵，2002：349）。但在 317 個新聞專業教育機構中，1982 年以後創設的佔三分之二；中共新聞傳播教育學者童兵的研究調查後指出，「這些新辦的新聞專業教育機構，相當一部份質量不高，存在散、亂、濫的問題」（童兵，2002：350）。

事實上，這問題的癥結仍在於中共新聞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新聞工作幹部，即從事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台的文字工作的人才」，這反映出中共對新聞宣傳人才的需求。中共新聞傳播學者謝炳炎亦不諱言，「這一需求長期反映在

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和專業建設，乃至辦學理念上，短期內是無法根本改變過來的，成為新時期新聞教育發展的一個痼疾」（謝炳炎，2003：76）。

（二）教材教學落後

誠如前述，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專業教材的編撰業已陸續編撰完成，但多屬於70年代或80年代初所編撰的，雖曾經修訂或新編，但隨著新傳播科技的運用以及中國大陸新聞媒體的蓬勃發展，以致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再者，有的教材內容非但老舊，且交叉重複嚴重，以不符合需求；另外，有相當一部份的新聞專業師資，因缺乏新聞實務經驗，對新聞工作缺乏深層次的了解，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同新聞實務嚴重脫節，則是當前中國大陸新聞教育仍待解決的問題（童兵，2002：350；謝炳炎，2003：77）。

（三）師資人力不足

誠如中共學者童兵所指出的，「新聞師資力量薄弱，一方面隊伍老化、流失嚴重，另一方面相當一部份新聞專業的師資缺乏新聞實踐經驗，對新聞工作缺乏深層次的了解，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同新聞實踐嚴重脫節」（童兵，2002：350）。根據中共的最新統計，全中國大陸從事新聞教育的教師從1982年的364人到2003年的1203人，卻分佈在317個新聞專業教學機構（無論是否經過中共教育部批准備案的，皆包括在內），平均每個新聞專業教學機構僅4人，師資人力嚴重不足。非僅如此，依據中共傳播教育學者謝炳炎的研究指出，「師資隊伍整體質量不高，學位整體偏低，例如在全中國大陸1203名從事新聞教育的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僅80餘人，具有碩士學位的也不過400多人」；此外，在謝炳炎的研究中並指出，「從事新聞教育的教師的職稱亦偏低，在全中國大陸1203名從事新聞教育的教師中，教授只有231人，副教授432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大陸新聞教育上的水平與質量」（謝炳炎，2003：77）。

（四）教學設備短缺

隨著新傳播科技的運用與發展，印刷媒體也由鉛字排版走向電腦排版，甚至網際網路的運用，導致電子報的出現；而電子媒體的廣播電視，也由類比走向數位化…等等；但這些設備價值不菲（據瞭解，如果要成立一間電視實習專業教室，其設備不含攝影機，單是專業級非線性剪輯工作站，就要50萬元左右的人民幣，另外剪輯練習用數位化作業軟硬體系統，也要近5萬元的人民幣，在加上其他的監視螢幕、切換器、影像聲音分配器……等，也要近6萬元的人民幣）；在各院校經費普遍不足的狀況下，也就造成中國大陸許多新聞專業教育機構雖開設相關課程，但教學和實習沒有相應的設備，導致上課時，猶如中共學者所形容的，「教學仍是傳統的一張嘴，一支粉筆，一塊黑板“滿堂灌”，學生任憑兩隻耳朵一枝筆聽課，幾十年不變」的狀況（童兵，2002：351）。

關於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現行之存在的問題，中共亦不否認；但在型塑開放形象，積極加入國際社會之際⁵，進行國內外的輿論宣傳始終是其重要的手段，因此，中共對於培育其新聞宣傳幹部的新聞教育，仍然持續在進行包括教育素質的提升、課程設置的新聞傳播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更新新聞專業課的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開始重視人文社會的基礎課程的變革，另外，在新聞教育設備方面，也陸續投入大筆的資金，例如武漢大學對新聞學科設備，投入高達 800 萬元人民幣，其他如，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等等，皆以大筆的資金投資在教育設備方面（謝炳炎，2003：78）。

陸、結論

綜合上述可知，中共自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同年 7 月，中共中宣部和國務院教育部聯合發出〈關於加強新聞教育工作的意見〉，中國大陸新聞教育開始步入變革時期。

1983 年中共召開第一次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中即對其新聞教育的未來發展方向和做法有所規劃；易言之，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從 1983 年開始積極走向變革。

眾所週知的，從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一直在中共的掌控之下，故而其變革亦是在中共的規劃下所進行的，雖然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機構也曾針對其長期以來新聞教育的痼疾，如：課程設置馬列主義思想政治理論重於新聞專業、教材老舊過時與重複、教學方法呆版以及師資的問題……等作調整；但經由中共學者的研究，足以發現：即便其課程設置內容與國際接軌、教學設備更新、革新教學方法、師資亦加以提升……等作變革（童兵，2002：350；謝炳炎，2003：76），但在辦學理念上無法將「為共黨所用的新聞宣傳幹部」做根本上的變革的狀況下，政治依然凌駕新聞專業，新聞傳播媒體仍然是喉舌、工具，其新聞傳播教育變革，不過是冀望其所培育的人才能符合現階段所用罷了。

⁵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實施「經改」以來，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快速發展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但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並發展軍事，另外，積極地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衛生組織，甚至東協區域組織等等，其參與國際社會，甚至冀望能參與主導世界的行列中的態勢極為明顯（《蘋果日報》2005/1/7；徐蕙萍，2005；詹哲裕、韓台武，2005）。

參考書目

(一) 中文部分

- 毛澤東（1990）。〈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江澤民（1990）。〈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傳播與社會》。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
- 伍振鶯、高強華（2001）。《新教育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李瑞環（1990）。〈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李良榮（2003）。〈新形勢下的報業集團與報業競爭〉，傳媒學術網—專家論壇。2003/11/28。取自：file//A:\媒網一家.htm
- 何舟（1993）。〈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聞傳播研究》。：。
- 何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
- 阮志孝（2004）。〈入世初大陸報業的現狀、問題、對策〉，傳媒學術網—專家論壇。2004/2/12。取自：file//A:\媒網一家.htm
- 林靜伶（1996）。〈幾個感性與理性的想法—對〈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的回應〉，《新聞傳播研究》。第五十三集。
- 林東泰（1999）。《大眾傳播學理論》。台北：師大書苑。
- 徐蕙萍（1989）。《中共新聞改革之研究—以中共的報紙為主》。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蕙萍（2004）。〈中國大陸體制下報業集團化之析探〉，《復興崗學報》（第八十二期）。
- 徐蕙萍（2005）。〈中共建立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析探〉，《復興崗學報》（第八十四期）。
- 盛沛林主編（2000）。《軍事新聞學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童兵（2002）。《比較新聞傳播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邵培仁、陳兵（2003）。《媒介戰略管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胡耀邦（1985）。〈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國新聞年鑑》。北京：中國新聞年鑑社。

- 胡耀邦（1990）。〈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社。
- 陳懷林、黃煜（1996）。〈中國大陸大眾傳媒商業化非均衡發展—以報業為案例〉，《新聞傳播研究》。第五十三集。
- 陳力丹（1999）。《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張多馬編著（1995）。《大陸新聞事業概況》。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詹哲裕、韓台武（2005）。〈東協組織運作機制及其所面臨的挑戰〉，《復興崗學報》（第八十四期）。
- 鄧力群（1984）。〈在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新聞年鑑》。北京：中國新聞年鑑社。
- 鄭貞銘、張世民、呂傑華增修（2003）。《新聞新論》。
- 謝炳炎（2003）。〈媒介變遷與大陸新聞教育改革〉，《掌握學術新趨勢接軌國際化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6。
- 《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11/30。
- 《人民日報》，1996/9/27。
- 《聯合報》，2005/3/25。
- 《蘋果日報》，2005/1/7。

（二）西文部分

- Chang, Won Ho (1989) *Mass Media in China :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Ames :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efeur, Melvin, (1970).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 David McKay.
- Mcquail, Denis,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CA : Sage.

（投稿日期：95 年 9 月 22 日；採用日期：95 年 11 月 6 日）

中共新聞教育變革初探